

〔浙〕新登字 1 号

责任编辑：周向潮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校对：朱晓阳

日本智慧：大“和”民族的乐章

冯 玮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

浙江岁盛实业有限公司激光照排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0 万 印数 1—5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057-3/G·269

定价：9.20 元

目 录

《世界的智慧》丛书总序	顾晓鸣
绪言	(1)
第一章 苹果梨和四不像摇篮曲	(1)
有亲有故 非驴非马的汉字	(1)
移花接木 偷梁换柱的假名	(6)
框架依旧 概念常新的外来语	(10)
符合逻辑的悖论和矛盾	(15)
不可理喻的微笑	(19)
礼貌用语的奥妙	(23)
“梯形结构”的礼仪	(27)
“撒旦的杰作”	(31)
似是而非的“哈依”	(35)
四大观念:智慧的结晶	(39)
第二章 知“性”和悟“性”变奏曲	(44)
诡辩:“粉红色的道德”	(44)
色情:巧妙的政治隐喻	(49)
“活人玩偶”:爱与情的分离	(53)
艺妓:生活和戏剧的合影	(56)
商业文化学:“妈妈桑”的智谋	(60)

传统节日：民族文化的侧影	(64)
“百炼的名刀”：大和魂的物化	(68)
竞争：主体和客体的超越	(72)
禅：智慧的修炼	(76)
哀婉之情：知性和情操的统一	(81)
第三章 艺术与生活浪漫曲	(85)
弄虚作假的技巧	(85)
酒饮微醉 花观半开	(89)
面具和脸谱：文化写真	(93)
歌道：智力七巧板	(98)
花道：三位一体的智慧	(102)
茶道：独步于世的艺术哲学	(106)
水中长出的智慧	(110)
天才的“气象学家”	(114)
鲟鱼的启示	(118)
烈火中永生的传统	(123)
第四章 商战奇才进行曲	(128)
“三河商法”：驾车开路	(128)
以小见大 开辟市场	(132)
扬长避短 避实击虚	(137)
企业文化：同与异的契合	(141)
启示+灵感=创造	(145)
逆境中崛起和“重建之神”	(150)
摄人心魂的“秋波”	(154)
选贤任能的“伯乐”	(158)
出新出奇：商业敏感的真谛	(162)
创造顾客：商业经营的不二法门	(166)
第五章 共性与个性交响曲	(171)

非暗房技巧的“延迟曝光”	(171)
尽人事+待天命=幸福	(175)
顺应大势 八面玲珑	(180)
知足常乐：“比较安慰术”	(184)
寓意丰富的文化符号	(187)
“和利”与“合力”	(191)
庭训往来和智慧之源	(195)
温泉和“沐浴文化”	(199)
天皇制：民族认同的杰作	(203)
尊崇和睦的大“和”民族	(207)
第六章 文化博览会随想曲	(212)
货币的“第六种职能”	(212)
无骨骼的软体动物	(216)
神话与“中空均衡构造”	(220)
绝妙的“宗教改革”	(224)
道亦有盗 盗亦有道	(228)
巧用偶像：形式和内容的分离	(232)
借荫纳凉 引水浇田	(236)
网开一面：巧用两刃之剑	(241)
“理性的顾客”	(246)
探隐发微的“福尔摩斯”	(251)
第七章 人生与自然协奏曲	(256)
生活“自然主义”	(256)
永不褪色的“和”服	(260)
功能不菲的家徽	(263)
前后颠倒的“魔带”	(267)
美不胜收的“画布”	(271)
世界第一的“杂食族”	(275)

“喜新厌旧”的美食家	(279)
发酵和酿造的营养素	(283)
匪夷所思的建筑	(286)
随意组合的“积木”	(290)

绪 言

日本是一个倍受关注的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从科技到文化,从被称为“撒旦的杰作”的语言到不可理喻的举止,从别具一格的衣食住行到匪夷所思的宗教信仰,从明白无误的礼仪规范到难以揣摩的心理倾向,从对外来文化的移花接木到对传统文化的固执保守……日本的一切,似乎都充满神奇,富有魅力。日本,仿佛成了迈达斯国王的领地。日本人,仿佛都有点石成金的本领。

日本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今天,无论我们将日本文化称作为“二重文化”、“混血文化”、“混合文化”、“同化混成复合文化”,还是称作为“杂种文化”、“合金文化”、“飞地文化”,本质上都是为了揭示日本文化多元的性格特征。这是日本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性格特征。

日本文化是一种充满矛盾,但又使这些矛盾和谐统一的文化:男权主义的世界和最受崇拜的女神,个人“出世”的强烈意识和群体观念的至尊地位,彬彬有礼和放荡不羁,墨守成规和随机应变,天皇与共和,自卑与自尊,“居酒屋”的红灯笼和“斯纳库”(轻食店)的霓虹灯交相辉映,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新郎新娘在门德尔松“婚礼进行曲”的乐曲声中迈出碎步……

这些似乎矛盾的事物在日本却并行不悖,和谐共存。正如 F·M·本格所指出的:“表意文字‘和’是和谐的意思,它被认为是日本人一种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①日本,真是一个由大“和”民族组成的国家。

毫无疑问,日本的神奇、魅力,日本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各种矛盾的和谐共存,是日本民族智慧的反映。这种智慧是日本独特的环境和历史遭际的产物,是日本在“文化的生活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性格,是日本文化之纲。为了洞悉和探究这种智慧,我以对日本文化的书斋研究和留学生活的亲身体会为依托,力图通过多维的视野,具体生动地从各个层次和层面开掘、描述和剖析日本民族的智慧,力求既不失世态风俗的情趣,也不失“阳春白雪”的雅致。既包容长时段的历史透视,也点触近距离的现实观察。既纵横交错,广泛涉猎,又去芜存精,纹理清晰。

本书不是吹嘘日本民族神威或披露其阴谋的小说,但所叙述的一些事例,却颇有文学色彩。本书不是阐释深奥哲理的学术专著,但对“智慧”本身的探悉,又不能不具有思辨色彩。总之,融知识性和理论性于一体,使读者能“窥斑见豹”地了解日本民族的智慧是本书的基本特色和作者的根本心愿。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被誉为日本“国民教师”的福泽谕吉曾经指出:“所谓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品行的进步。由于能获得这种人的安乐和品行的,是人的智慧和道德,因此,所谓文明,可以说归根结蒂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同时他又指出,人类社会所有善的东西均基于有智,所有恶的东

^① F·M·本格:《日本:一个国家的研究》,华盛顿,1983年,扉页。

西均基于无知。^①日本另一位名人加藤弘之则指出：“在野蛮未开化的人民中，强者的权利唯以粗暴凶猛的方式来表现，而在文明开化的社会里，强者的权利唯以高尚优雅的方式来表现。”^②所谓的“高尚优雅的方式”，当然就是以智取胜。这两位日本的“智者”对智慧与社会进步之关系的诠释，是日本人对“智慧”之认识的典范，也是作者的写作指南。因此，本书虽然分为七章七十节，每个章节均涉及一个相应的主题，且看似巧立名目，但是，突出智慧显在和潜在的运作，突出智慧对形成独特的日本文化的影响，则是贯穿全书的红线和全书的宗旨。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许多受人尊敬的日本问题专家有关方面的论著，颇受教益（这些论著的名称可参阅本书的注释，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本丛书的主编顾晓鸣教授也以其独到的见解为我提供了不少启迪。对于这些教益和启迪，我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学而为智，不学而为愚。”笔者才疏学浅，撰写《日本的智慧》，难免无智者言智之嫌。然而，“急中生智”，正是在抽丝剥茧般地剖析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苦苦寻觅其智慧内核的过程中，作者自身也感受到了智慧的灵光，并因此而如释重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日本的智慧是世界的智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共同拥有这笔财富。

复旦大学文博学院 冯玮

1994年2月

① 《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第10页。

② 转引自吉田旷二《加藤弘之研究》，新生社，1976年，第91页。

苹果梨和四不像摇篮曲

有亲有故 非驴非马的汉字

一般而言,将汉字作为日本在古代曾经向中国学习和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标志,是最恰当的。如果以此来衡量中日文化的关系,那么显而易见,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血缘”是相当近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曾经宣扬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是源出一系的邻邦。

确实,汉字在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京的大报上使用的汉字有 7500~8000 个。1946 年,日本文部省建议将使用中的汉字,即所谓的“当用汉字”减为 1850 个,并将 740 个汉字加以简化,使汉字的地位有所“削弱”。但是,据 1981 年 10 月日本政府公布的“当用汉字表”,“当用汉字”仍有 1945 个之多。今天,据初步统计,日本报刊杂志上使用的汉字为 4000~5000 个,在各类学术专著中使用的汉字,有 8000~10000 个。漫步日本街头,各种以汉字书写的店名、广告、招牌触目皆是,给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以未入

异域之感。

众所周知,汉语至少在 4000 年以前就已形成了书写系统。由书写系统组成的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字都有自己单独的意思,其中很多字是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根据考古发掘,最初的汉字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即商朝那些刻在龟甲上的玄妙难懂的甲骨文。这些早期文字无疑是今天中国和日本汉字的雏形。又经过几个世纪,书面汉语进一步发展。大约从公元 2 世纪开始,汉语从中国向毗邻的东亚国家传播、辐射。书面汉语在东亚所起的作用,尤如拉丁语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人们要完成良好的教育和修养,必须学好汉语。关于汉字究竟何时传入日本,目前尚无确切的定论。按中村元先生的观点:“大约在 1400 年以前,汉文就传入了日本。直到推古朝(6 世纪),只有一小群专家使用汉文,他们对当地的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随着与中国直接交往的开始,以及隋唐文物制度的输入(6~9 世纪),学汉语和读汉文的人数才大大增加。”^①另外,按梅棹忠夫先生的观点:“据研究,汉字和书面汉语最初是在公元 5 世纪从朝鲜传到日本的,那时候的许多书面文献在日本流传至今。”^②不过,汉字的引进,在日本历史上似乎可以追溯到公元起始前后。因为,日本志贺岛黑田藩的农民甚兵卫,曾经发现了一颗缀有蛇纽的金质印章,印面上用隶书刻着“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据说,这颗玺印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赐给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国主的。由此推测,日本

^① 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马小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31 页。

^② 梅棹忠夫编:《77 把钥匙——开启日本文化的奥秘》,彭前旭、李名宏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 年,第 41 页。

列岛最初接触汉字，有文字记载的，应该从此算起。当然，公元 285 年王仁将《论语》、《千字文》等汉籍传入日本，可以作为汉字正式引进日本的证明。事实上，“汉字”本身的含义，已经显示了这一点。

汉语的传入，使日本人获得了“一件呼风唤雨的法宝”。本来要在泪与汗、乃至血与火的争论中才能获得的结论，由于汉文汉籍的引进而骤然呈现在日本人的面前，变得“得来全不废功夫”，使日本人借以“呼风唤雨”：

——何为人生的意义？人应该怎样生存？这类问题久争不决，但只要翻开那些典籍，答案几乎是现存的：“子曰：……”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各个派别经过无数次争论而提炼出来的精髓，都以经典的形式汇集了起来，供日本人选择。

从 6 世纪到 9 世纪，日本人开始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对汉文汉字的学习，也不断趋向高潮。当时，日本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系统教授汉语的学校，使汉字教育得以普及。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 200 年间，上至天皇和达官显贵，下至文人墨客和黎民百姓，对中国唐代的文化，特别是唐代的诗赋文章推崇备至，趋之若鹜，其汉语水平也不断提高。例如，日本的文武天皇曾作过一首题为《述怀》的诗，不仅格律、意境俱佳，而且词藻、技巧也足以和唐代诗人媲美：“年虽足载冠，智不敢垂裳。朕常夙夜念，何以挫心匡。就不师往古，何救元首望。然毋三绝务，且欲临短章。”由于天皇和朝廷的扶植和鼓励，日本诗人辈出，并出现了第一本日本人写的“唐诗”集《怀风藻》。以精通汉文，尤其是以精通汉文的诗赋文章为荣，一时成为日本当时的社会风尚。不仅如此，日本当时还规定，朝廷的诏敕，太政官的命令，地方政府上呈朝廷的请示报告等，必须全

部采用汉文书写,从而使汉文成了当时日本朝廷的官用文字。至公元8世纪,日本已经编纂出了各种各样的汉文书籍,如《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纪》,等等。

在武士当权的镰仓时代(公元1185~1335年),作为武士重要精神支柱的佛教禅宗派信徒留学于中国,并邀请中国的佛学大师到日本讲经传道。通过这些交流,一种新型的书面汉语在日本发展了起来,并形成了以此为基础的所谓“五山”禅宗文学。至江户时代(公元1600~1868年),儒家学说被立为日本的官方哲学。幕府为了宏扬儒学,在江户修建了研究院和儒学圣所。与此相呼应,办汉语学校,以汉语写成的儒学经典为教育蓝本,也得到了大力提倡。

以上略述了汉字在日本传布的大致经纬,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毫无疑问,汉语深深地影响了日本语言和文化。日本人善于学习和借鉴别国优秀文化的拿来主义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体现。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智慧,还不限于此。正如希腊语和拉丁语被欧洲人用来创造新辞和专用词一样,汉语在日本也有类似的遭遇,而且这种遭遇显得更为奇特。可以说“日本人书写的汉语,花样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面目全非”^①。确实,虽然日本从中国学去的汉字并未完全脱胎换骨,但它的读音、含义,许多已和正宗的汉字大相径庭,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下面叙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许能证明这一点:

数年前,中国某代表团应邀访问了日本。期间,他们参观了一家工厂。走进厂区,他们发现一块写着“油断一秒,怪我

^① 《77把钥匙——开启日本文化的奥秘》,第41页。

一生”的标语牌赫然醒目。在标语牌旁边，工人们正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参观结束后，代表团团长对主人的热情接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不无感慨地说：“日本工人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实在令人钦佩。哪怕机器中的油间断一秒，他们也要作一生的反省。”他表示，回国以后，一定要将日本工人这种极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介绍给中国工人。日方主人最初对他所说的“油间断一秒，作一生反省”的话感到莫名其妙，待弄清原委后，不免忍俊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日语中的“油断一秒，怪我一生”虽然从外形上看和中文里的这几个字完全一样，但意思却迥然有异。在日语中，这几个字的释义是“疏忽一时，残疾一世”（“油断”意为疏忽，“怪我”意为受伤），树立这块标语牌的目的，是为了让工人们注意安全生产，谨防事故的发生。它是对工人人们的提醒，而不是工人们用以鞭策和督促自己的座右铭，更不是他们工作态度的写照，尽管他们的工作态度的确有令人钦佩之处。中方代表团团长之所以对上述8个字作出望文生义的理解，主要是由于他不了解日本的汉字，是经过日本人刻意改造，经过“日本化”处理的汉字，是一个中国人若不明究里容易陷入的误区。这一误区，事实上正是日本民族独特的性格和独特的智慧的产物。因为，和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道理一样，使中国人看得懂本来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汉字还不是日本人的智慧本质的体现，而使中国人看不懂本来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字——汉字，才是日本人的智慧本质的体现。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品味便不难觉察，误解“油断一秒，怪我一生”8个字的故事，是对将日本人称为“模仿的机器”的观点的一种针砭和指控。

日本的汉字有亲有故，它和中国的汉字有着藕断丝连般

的血缘关系。但是，作为“汉字”，它经常显得“非驴非马”。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产物，它也是大和民族智慧的杰作。

移花接木 偷梁换柱的假名

美国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在他的《日本心魂》一书中指出：“现代日语基本上是日本 1500 年之前的非书面语言与古汉语勉为其难地联姻之后的产物。这种结合实在不那么般配，因为汉语和日语在语法和其他许多重要方面截然不相同，简单地说，二者在日本的杂糅，结果就像用阿拉伯文手写体来写英文，或在英语口语中夹进 3、5 个中世纪阿拉伯语音节，弄出一些复合词来。”^①然而，正是在这种“勉为其难”的联姻中，日本人显示出了一种“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独特智慧，并因此而奠定了日本文化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

现代日语，基本上是一种表音文字，它的拼音字母，就是所谓的“假名”。假名是在吸收和借鉴汉字书写方式和读音的基础上形成的。将表意的中国汉字用作表音文字，即将汉字的原有含义抛在一边，仅借鉴它的发音，是创作假名的最初思路，是一种智慧的表现。这种情况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的记载。根据考古发掘，对汉字“取其音而舍其意”的现象，至少在公元 5 世纪左右已经出现：在日本和歌山县的隅田八幡，曾出土了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上有“押坂宫”（反正天皇的都

^① 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日本心魂》，贾辉丰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年，第 28 页。

名)的字样,但它是用“意志沙加”这一汉字的发音写的(“押坂”日语读作おしか;音似“意志沙加”)。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日本最早用汉字为日语注音的文献。可见在汉字输入日本以后不久,日本人已经开始将它作为拼音文字而加以改造和利用。

公元8世纪,日本人编纂了题为《万叶集》的诗集,收集了约4500首诗歌。《万叶集》是掺和着汉字写成的一部具有日本式文学体裁和风格的诗集,其中的汉字已完全丧失汉字的本来意义,它们只是被当作一种符号来表示日本语音。这种掺和着汉字的书面日语样式,被称作“万叶假名”。万叶假名巧妙地利用了汉字,将一些特定的汉字安插其中代表日语的特殊语调和语音。在《万叶集》中人们发现,当时的日语假名有88个音,而不是今天的50个音。万叶假名是大量使用汉字为日语注音的开端,它的形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现代日语,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

万叶假名显示了“正宗的”日本语言文字与中国汉字的血缘关系,同时也显示了日本人并没有对中国文化囫囵吞枣般地全盘吸收,而是加以改造和利用,借他山之石,攻本国之玉的明智态度。

文字是文化的构成元素,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莫过于文字的传播。反过来,一种文化独立性的标志,也在于是否形成并具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积淀了该民族文化的基本内容。所以,引进这个符号系统,当然意味着吸收该民族的文化思想,并有沦为“文化殖民地”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起自己的文字符号系统,筑起一条使外来文化难

以直接逾越的屏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万叶假名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它帮助日本人摆脱了被中国文化完全同化的危险，使他们不致完全陷入中国文化圈里，从而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日本人的祖先为吸收中国大陆文化所作出的努力是非常惊人的。他们的代表——遣唐使冒着生命危险“出洋留学”，就是一个明证。但是，正如日本成语“盗木乃伊的人常常变成木乃伊”所显示的，由于日本的一切制度乃至服饰都尽量从唐朝移植，因此日本人，特别是一些达官显贵的思想，产生了“殖民地化”的危险，使日本的民族特点和文化个性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万叶集》，不仅仅是一部抒情诗的经典作品，一部流露人的真情实感，歌唱人的自然心灵的杰作，更重要的是，《万叶集》是从对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抵抗出发而形成的感情的文学，是维护民族文化独立性的产物。

不过，万叶假名比较烦琐，因为其中使用许多不同的汉字，而每个汉字本身又很复杂，笔划很多，而且用来表示日语发音的汉字没有约定俗成，往往因人而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至平安时代初期，日本人经过反复实践，终于创造了一套较为简单的发音系统，即由片假名和平假名两组假名组成的“日本拼音文字”。

片假名由高度简化的符号组成，这些符号都是通过摄取原有汉字的一部分而构成的，如片假名“力”，就是汉字楷书“加”的一半。同样，平假名也是通过缩减和简化汉字而构成的。所不同的是，它不像片假名那样只取汉字的一部分，而是利用、简化汉字的结构。如平假名的“あ”，就是在汉字草书“安”的基础上构成的。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出现，使日语得以

脱离汉字这根“拐棍”而独立发展。它标志着日本民族文字的形成,对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时,在中国的四邻居住着许多没有自己文字的不发达民族,他们都受到了中国发达的文化浪潮的冲击。但是,只有日本民族主动地将中国文化的元素——语言文字加以消化和变形,化为自己的血肉,从中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字。

从“意志沙加”到万叶假名和平假名、片假名,日本人在形成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智慧。他们能够以借其形而忘其意的方式,十分巧妙地将外来文字作为创造自己民族文字的基础。这一点,和一些放弃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字,全面接受外来语言文字,自甘沦为“文化殖民地”的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当代美国最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奥·赖肖尔所指出的:“从7世纪到9世纪,尽管声势浩大的外国文化浪潮席卷了日本,但日本人看来设法保持了对其固有特性的清醒认识。”^①

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犹如登山。在登山时,如果前人已经树立了前进的路标,那么后人循着这些路标前进,将比较容易地到达顶点或目标。反之,则费时费力,且有迷路之虞。但是,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又不同于登山。如果完全循着路标前进,则难免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之讥,不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创新之路。众所周知,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著名的旅日华人作家陈舜臣认为:“中国人是一面向前走,一面树立路标的民族,而日本人则是依靠着路标

^① 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陈文寿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8页。